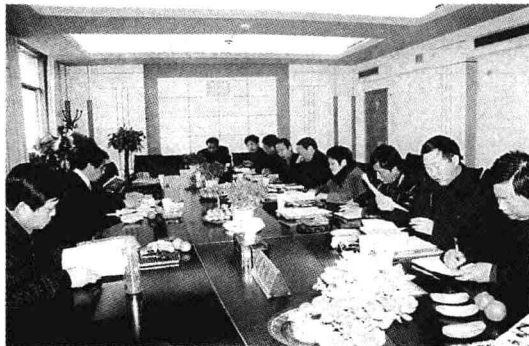


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 研究 2005 年度党史工作

□ 本刊记者



3月4日下午,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会议在市委常委会议室召开,市委副书记、市委党史委主任张士勋,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市委党史委副主任谷来勋,市委党史委委员包长修、阎执荣、赵安民、王勇、宋聚章、张继民、王道安、宋彩亮、陈剑江及委员单位负责人付卫平、戚正伦、陈云昌、王宠惠等15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谷来勋秘书长主持。

会议听取了市委党史委委员、党史研究室主任阎执荣同志关于全省党史工作会议精神、2004年全市党史工作情况、2005年的工作计划及需要研究解决的几个问题的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党史工作及需要解决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讨论,市委副书记张士勋同志作了重要讲话。

与会人员一致认为,2004年,市委党史研究室克服人员少、工作条件简陋等困难,立足于党史工作实际,埋头工作,拼搏进取,编辑出版了《商丘当代人物大典》、《胡锦涛在商丘》两书,出版了《商丘党史》期刊5期,顺利开展了《辉煌历程——商丘改革开放二十五年》一书有关资料的征集编写,成功运作了彭雪枫殉国60周年纪念大会,为加快商丘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资政服务。与会人员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赞誉,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

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谷来勋指出,2004年党史工作成绩显著,尤其是在筹备召开彭雪枫殉国60周年纪念大会中,市委党史研究室先后2次到北京、17次到郑州、7次到夏邑,开展了一系列扎扎实实、富有成效的基础工作,为宣扬商丘、扩大商丘的知名度做出了贡献。对于2005年的工作安排,谷来勋秘书长表示赞同,并强调指出,动员社会力量撰写1949—1978年间的党史专题,要区分部门、行业、层次,拟出题目和写作计划,加强

分类指导。

市委副书记张士勋同志作总结讲话。他指出,市委党史研究室工作积极主动,党史编研成果丰硕,党史宣传教育深入扎实,并在社会上引起较好反响,市委对此项工作是满意的。对于党史工作需要解决的5个问题,经与会人员研究讨论,一致同意:①举办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要根据中央、省委的有关指示精神,由市委宣传部牵头,安排部署全市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活动。市委党史研究室要根据统一部署和安排做好各项宣传教育工作。②将商丘地方党史纳入市委党校主题班次教学之中,很有意义、很有必要,这一做法多次受到省委有关部门表扬,要作为一种制度落实好、坚持好。党史教科书工本费可考虑从党费中支出。③撰写1949—1978年间党史专题,这是撰写党史第二卷的基础工作,任务极其繁重,加之档案资料缺乏、调研困难,单靠党史部门的力量难以完成。因此,做好这一工作,必须开门办事,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参与此项工作。市委党史研究室要拿出切实可行的工作方案,拟写题目,组织全市各县(市)区、市直各单位撰写专题,组织有关专家进行审校。④党史事业经费主要用于查阅征集各级各类档案资料、外出调访老干部、购买有关党史业务书籍、召开党史专题分析会、举办党史业务培训班和外出学习编写经验等。目前,经费较少,难以保证开展工作需要。党史工作者需要各有关部门的理解、支持和帮助。请市财政部门年度预算时给予考虑增加。⑤目前,我市大量党史资料、党史书籍存放在租赁的4间民房里,即不能有效利用,且存放也不安全。党史档案存放问题,请机关事务管理局认真考虑解决。



商丘党史

2005.1

中共商丘市委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

中共商丘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

主任:

张士勋(市委副书记)

副主任:

高献涛(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部长)

李光明(市委常委、商丘军分区政委)

张琼(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

谷来勋(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

委员:

包长修(市委常务副秘书长)

张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赵安民(市委宣传部分副部长)

阎执荣(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王勇(市委党校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

宋聚章(市委老干部局局长)

卢树祥(市财政局局长)

张新华(市教育局局长)

徐效仁(市民政局局长)

张继民(市直机关工委书记)

王道安(市档案局局长)

豆洪亮(团市委书记)

宋彩亮(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陈剑江(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卷首页

- 1 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 2005 年度党史工作 本刊记者

领导论述

- 4 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市委书记刘满仓在市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本刊记者

资政之页

- 5 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历史演进 北史文

伟人风范

- 8 毛泽东的俭朴生活 杨春贵
- 10 大无大有周恩来 梁衡

艰苦奋斗的共产党人

- 14 马庆华与一件白衬衣 石岩
“猪肝”·“香肠”·“革命虫” 盛立
- 15 草鞋 赵青山 熊航昌
彭师长卖马 侯永之

学习雷锋好榜样

- 16 雷锋精神长存 蓝砚

时代先锋

- 18 李学生,农民工的人生壮举 戴鹏 袁亚平

纪念鲁雨亭殉国 65 周年

- 20 雨亭精神 浩气长存 张士勋
- 21 鲁雨亭率部开辟夏邑抗日民主根据地纪事 谢胜利

商丘抗战英烈谱

- 24 沈东平、马庆华、鲁雨亭、唐克威 李冬丽

党史人物

- 26 尚明,商丘人的骄傲 卢银课

党史回眸

28 当市长的日日夜夜 王飞霄

党史春秋

31 农民副总理陈永贵走出“中南海”的前前后后 ... 史世平

与时俱进

35 与时俱进铸辉煌

——全国“双优”先进单位、商丘市新华书店 2004 年度工作侧记 本刊记者

37 全面强化措施落实 全力维护大局稳定

——新城办事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成效显著 李中须 李开胜

39 诚信永恒 追求卓越

——来自商丘市淮海驾校的报道 牛本良

40 强化能力建设 全面提高素质

——梁园区人事局各项工作又上新台阶 范时光

41 廉洁自律树正气

——梁园区烟草局党风廉政建设纪实 盛立

42 民政路上的排头兵

——虞城县民政局工作实录 杨宾 健波

创业者之歌

43 创业者之歌

——记河南省劳动模范、商丘市第一化肥厂厂长牛光磊

..... 盛立 一鸣

44 丹心清风谱新篇

——记睢县审计局局长韩典启 张荣兴

45 杏林拓荒铸辉煌

——记“省十佳妇幼保健院”商丘市妇幼保健院院长、第四届“中国改革百名优秀人物”李阳 本刊特约记者

理论纵横

47 关于税费改革后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思考 权洪涛

48 深化改革促发展 创新机制活经营 杜立宪

民营企业之星

50 享誉国内外的中亚工艺厂 郭登峰

红色旅游

51 人工天河——红旗渠 河社

纪念地采风

52 鲁雨亭烈士纪念馆 高永澜

大事记

53 2005 年 1 月~3 月大事记 市委党史研究室

工作信息

64 市委党史研究室全面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市委党史研究室

总 编:宋彩亮

副总编(执行) 谢胜利

编 辑:(以姓氏笔划为序)

马 云 卢彦林 刘玉芳

关 颖 李 伟 陈 永

张相政 张艳梅 豆培海

杨 宾 洪广亮 高永澜

贾建峰 郭登峰 梦 飞

韩永胜 裴纯启

美 编:盛 立

地 址:市委 2 号楼 6 层

电 话:(0370)3288512 3288550

邮 编:476000

深入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重要保证

——市委书记刘满仓在市委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
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摘要)

□ 本刊记者

1月28日,中共商丘市委召开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工作会议,市领导刘满仓、毛凤兰、王保存、张士勋、王师灿、高献涛、吴宏蔚、王国清、王建民、周金铎、付元清、胡家印、屈秀菊、胡向阳、李德才、翟建国、张修起、李志经等党员领导干部及省督导组组长崔兰婷出席会议。市长毛凤兰主持会议,市委书记刘满仓作重要讲话。

刘满仓强调指出,在全党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中央着眼于新的历史条件下使我们党与时俱进、始终保持先进性而作出的战略决策,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各级党组织一定要认真学习,准确把握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切实解决好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的突出问题,解决好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解决好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确保教育活动扎实深入,取得实效。

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重大部署,是坚持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全党、永葆党的先进性的重大举措,是“固本强基”、提高党员队伍素质的重要途径。同时,也是推进我市跨越式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因此要通过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把广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上来,把党的先进性要求转化为全体党员的实际行动,将极大地促进广大党员进一步增强加快发展的责任感、紧迫感、危机感和使命感,激发投身发展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和本领,真正做到发展有新思路、改革有新举措、工作有新成效、各项工作有新局面,为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强保证和强大动力。

搞好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准确把握先进性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目标要求,注重教育活动的成效。

一要着力解决好党组织和党员存在的突出问题。要通过先进性教育,不断提高各级班子、各级领导干部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和处理复杂局势、复杂问题的能力,努力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政治坚定、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勤政廉政、团结协调的坚强领导集体;要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实践者;要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坚持理想信念,勤奋学习,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努力工作,坚持遵守党的纪律,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二要着力解决好党的建设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要创新党的组织形态,调整党组织的设置方式,坚持组织覆盖与工作覆盖相结合,扩大覆盖面与增强凝聚力相结合,加强组织建设与发挥党员作用相结合,努力做到有党员的地方就有党的基层组织,有生产经营活动的地方就有党的基层组织,有党组织的地方就有党的活动和坚强的战斗力;要丰富党组织活动内容,创新党组织活动的载体,搭建有形舞台,确立可行目标,发挥模范作用,让党员进一步“动”起来,把群众进一步“带”起来,让党的先进性进一步展示出来;要改进党组织活动方式,让活动体现时代性,体现针对性,体现实效性。三要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要解决少数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腐败问题,解决干部作风中存在的问题,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问题,努力做到统一思想、高度重视,努力做到严肃查处、坚决纠正,努力做到标本兼治。建立机制,努力做到落实责任,齐抓共管。四要着力解决好改革发展稳定中的突出问题。要把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与推动思想再解放、观念再更新相结合,与推进快发展、大发展

紧密结合,与解决城乡群众生产生活困难紧密结合,与改善经济发展环境紧密结合,与构建和谐社会紧密结合,使全市人民切身感受到先进性教育活动带来的深刻变化。刘满仓要求,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党中央确定的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任务繁重,要求很高。要想取得预期成效、预期目的,各级党组织务必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加强领导,开展好一系列活动,提高教育活动水平。

要建立领导责任制、领导干部联系点制度、督导制度、群众监督评价制度,严格落实责任。要理论联系实际,务求实效。把握好学习重点,解决好“学什么”的问题;创新学习方法,解决好“怎么学”的问题;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解决好“如何用”的问题。要坚持正面教育,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进党员自我完善、自我提高。在批评的过程中,既要严格要求,开诚布公,以诚相待,敢于触及矛盾,又要坚持原则,不搞造谣中伤和打击报复。要发扬党内民主,走群众路线,激发党员参与教育活动的热情。要坚持领导带头,发挥表率作用。每一名党员领导干部,既要切实担负起教育活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职责,又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教育活动,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教育活动的有关规定,积极参加学习。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根据党政机关、城市基层、农村等不同领域、不同行业党员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保持先进性的具体要求,根据党员的思想觉悟、政治素质、文化水平、接受能力的个体差异,合理安排教育内容和方式。要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各级党组织要采取多种形式,运用报纸、电台、电视台、网络等多种宣传手段,大力宣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大意义、指导思想、目标要求和工作原则,及时宣传报道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好做法、好经验,积极宣传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中的先进典型,为先进性教育活动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中国共产党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历史演进

□ 北史文

一、建国后的三次执政忧患

党的执政方式和领导方式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执政方式是执政党领导和控制国家政权的范畴。领导方式是党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实行领导的总称。其中,党对国家政权实行领导的方式就是执政方式。

中共执政以后,有三次大的执政忧患。一次是进城之初,从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看,就是要全面解决从农村到城市重点转移、在全国执政的问题。一次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央把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列为干部教育的主要内容,从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四清运动,到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希望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巩固中共领导和执政地位所做的尝试,可惜从路线到全局都是错误的。一次发生在1989年政治风波、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剧变之后。1989年以来的15年,是中共对自身领导和执政反思最多、措施最多的时期,直到把共产党执政规律提高到和人类社会发 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三个规律”并重的高度。

二、党的一元化领导方式的由来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执政方式的变化

所谓“一元化”领导方式就是党政不分,党、政、群、企、事相互不分的高度集权的人治型领导体制,实际最后导致“一人化”领导。“一元化”领导源于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194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立了党政军一元化的领导模式。建国初期,仍发生影响。

党执政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对党政分工的认识有几个阶段的变化。

1、建国初期,认为民主建政核心问题是解决几个革命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下联合执政问题。

一是保证党的领导权,二是处理好各革命力量的关系,主要是中共和民主党派的关系。党的政治领导和执政必须通过政府来组织实施,通过党在政府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组织不能从外部直接指挥政府,不能直接向群众发号施令。

1949年11月中共相继颁布《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建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决定》、《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建立中国共产党党组的决定》,以解决在中央政府内建立党组织和实现党对政府领导问题。与此同时,中宣部在下发的一个指示中指出:“在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之后,凡属政府职权范围的事,应该由政府讨论决定,由政府明令颁布实施……不再如过去那样,有时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向人民发布行政性质的决定、决议

或通知。”

1950年1月9日,周恩来在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成立会议上指出,党组的工作在形式上不要管得那么多,行政上的事务还是经行政机构去办。3月16日,他主持政务院党组干事会,议定同党外民主人士密切合作的指导原则:政务院机构中的党组会议不要代替行政会议;要健全政务院各部门行政会议制度、办公制度和汇报制度,保证有一定的必要的形式,不可党内党外不分,要使党外负责人加强责任感,在其职权范围内敢于做主,等等。

1951年10月18日,政务院副总理董必武在写给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的信中说,“党直接做政权机关的工作是不好的”。11月,他又在政务院法律委员会召开的会议上强调:党“是经过在政权机关中的党员来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的。但并不是直接指挥国家政权”。这些原则当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在董必武致信饶漱石后,毛泽东12月4日复信董必武:“我认为你给饶漱石同志的信的内容是正确的,可以抄华东以外各中央局负责同志一阅,促其注意这件事。”

这些精神,也反映在北京市的工作中,1951年2月10日,北京市人民政府党组关于与党外人士团结合作问题向市委并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提出:“(政府)党组只应讨论有关原则方针的问题,不必过多地讨论具体执行问题,更不应代替行政机构,直接处理行政事务,使党外人士感到无事可做”。同时具体指明:“如果党外人士任正职,那就应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下,给予他们总揽全局和最后决定之权;如果党外人士任副职,也应在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下,使他们在自己职权的范围内,能够放手做事,不受干涉”。对此,中央曾批示加以肯定,并要求各地仿照施行。

2.1953年起,党在执政方式问题上,认识和行动产生了矛盾和偏差,一方面说要建立由人民掌握国家最高权力的民主政治制度,另一方面开始实行以党代政。

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没有制宪之权,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议”。1953年1月4日,毛泽东还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府,仍将是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统一战线的政府,它是对全国人民都有利的”。中共领导制定了第一部宪法,领导形成了人民代表大会理论与组织框架,在4.5亿人口的大国举行规模最大的选举。1954年,毛泽东还指出:“有了人大,并不妨碍我们成立政协进行政治协商”,“政协不能搞成国家机关”,“政协不仅是人民团体,而且是各党派的协商机关,是党派性的机关”。

这些意见是确实贯彻了的。以北京为例,《市委关于北京市、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情况向中央、华北局的报告》中,除强调党员、产业工人、劳动模范代表的比例外,着重指出在人大代表中要“适当吸收其他各阶层中有代表性的、历史基本清楚的、接受我党领导的左翼和中间的非党人士,并有意识的安排一定数量的右翼分子,以加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

关于党和企业的关系,1955年,国家主要领导人刘少奇指出:“现在党委的工业部都在管业务,但慢慢要转到管干部、管政治思想和实行监督方面来。地方党委要能把不应该管的事推出去,要把业务部门的机构健全起来,提高他们的水平,把不应该管的推出去,才能做自己该做的事。”

但是正确与错误往往交织进行,党通过政权机关执政、党政职能分开做法很快就转了向。1953年3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下发《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规定:一、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均须事先请示党中央,并经过中央讨论和决定或批准以后,始得执行。政府各部门对于中央的决议和指示的执行情况及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均须定期地和及时地向中央报告或请示,以便取得中央经常的、直接的领导。所有政府各部门召开的专业会议,凡属性质重要而不是解决纯业务性或技术性问题的专业会议,均应执行事先报告并经过中央批准始得召开的原则。二、为了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以及便于政府各部门中的党的领导人员能够有组织地、统一地领导其所在部门的党员,贯彻中央的各项政策、决议和指示的执行,今后政府各部门的党组工作必须加强,并应直接接受中央的领导。因此,现在的中央人民政府党组干事会(由政务院党组干事会改组而成)已无存在的必要,应即撤销。三、今后政务院各委和不属于各委的其他政府部门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工作均应分别向中央直接请示报告。今后政务院所属各委、部、会、院、署、行直接提请政务院批示或办理的事项,除例行事务外,凡属涉及方针、政策、计划的事项,均应限于中央已经讨论和决定了的问题,或是中央已经批准的计划或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问题。如应向中央请示报告的事项而竟未向中央提出,则最后经手的政府负责同志应负主要责任。四、今后应将政府各部门工作有计划地提请中央讨论,以便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的领导。第一期讨论计划暂定为十一次或十二次。中共中央下发此决定的批示中说:自即日起在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门先予试行。各大行政区、省(市)两级,亦应由各中央局、省(市)委仿此决定草案,根据当地实际情况,自行规定具体方案试行。此前,毛泽东还有一个批示:“凡政府方面要经中央批准的事件,请小平同志多管一些。”

采取以党代政的运行机制,造成两种后果:一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回避承担具体的政府责任;一是政府职能被分割为若干“口”,不再存在完整意义上的政府及名副其实的政府首脑,只有在党中央这个层次上,才能实现政务的协调配合与统一部署。

1953年3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系统各部门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加强中央对于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草案)》明确划分了政府工作的五个

方面及其责任人。4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经济部门工作领导的决定》进一步将政府财经工作划分为五“口”,分别由高岗、陈云、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等负责,毛泽东称之为“五口通商”。5月14日,政务院发出《关于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财经部门的工作领导的通知》,规定各财经部门的工作分属高岗、陈云(在陈休养期间,由薄一波代理)、邓小平、邓子恢、饶漱石五人领导。在五人之下分设五个办公室,分别称为财委第一至第五(工字、财字、交字、农字、劳字)办公室。各自直接对党中央负责,总理办公室仅负责五口的联系事宜。

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发展党内民主、健全国家制度提出很多好的设想,例如,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方针政策上对于一切工作起领导作用”,但“不是说,党应当把一切都包办起来,对一切都进行干涉”。但是这些思想和制度设计未能在实践中坚持下去。

3.随着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始,党的一元化集权领导模式最终形成。

1958年5月,毛泽东对陈云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修改时加上一段话:“无论是工业方面、农业方面、财贸方面或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的方针问题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做出决定。在执行决定的时候,又应经常注意检查,并且可以用座谈会、辩论会、大字报、大鸣大放的办法,敲起警钟,批判脱离群众和离开党委领导的倾向”。1958年6月,毛泽东批评国务院和经济部门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决定成立中央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小组,具体领导政府各职能机构。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指示:“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做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1959年6月,毛泽东发出中央要重新集权的指示,将权力集中收归党的系统。1960年9月,重设党的6个中央局,统一领导地方党政军群。

党委加强分口领导制度,行政重要问题都由分管书记拍板定案。企业也同样如此,1956年北京市第二次党代会报告认为:“在企业中实行一长制,根据我们的经验并不适用……企业中的党组织必须对行政、工会、共青团实行统一领导”。

这样,各级组织和部门最终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工、农、商、学、兵、党、政,这七个方面,党是领导一切的”,以及“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的领导原则。

与这种一元化领导原则相适应,党的领导方式、执政方式和具体制度主要有:党委制和党组制;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首长负责制;党管干部制度;分口领导和双重领导制度;有关案件党内审批制度等。在实际运作中,横向表现为党对政的集中、政对群团、经济文化组织的集中,纵向表现为中央对地方、对基层单位、直至对群众个人的集中。

4. 1961年国民经济进入调整,政治关系也相应调整。

北京市第三次党代会政治报告用大量篇幅讲问题、讲缺点,强调要克服“一揽子”、“分片包干”的作法(指党委和行政等其他方面开一揽子会议决定问题、党委分口领导代替行政,并互不统属),党委不要包办代替行政事务,要充分发挥各级行政组织的作用。“今后,党委应集中力量研究党的方针、政策,检查执行政策的情况,做好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加强党员教育,健全组织生活等”。1962年,中共中央批转华东局《关于取消党委分管书记名义的意见》,取消了分管书记的名义。

5、“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快打断了党政关系调整的健康趋向。

先是全面夺权、“踢开党委闹革命”,不少地方党的正常生活不能开展。中共九大以后,党的领导原则又被推演为“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党是领导一切的”。强调党对一切经济、政治、文化组织的所谓“绝对领导”。党委会与革委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革委会自身又成为集党政企于一身的混沌体。1975年宪法规定:地方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设机关,同时又是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这不能说不是国家体制的一次大倒退。

党内民主同样受到削弱,以北京市出席中共十大代表选举为例,据北京市委1973年7月《关于协商选举十大代表的情况报告》北京市出席中共十大代表产生办法,是由市委扩大会议提出候选人名单,通过各区、县、局、厂矿、院校党委扩大会议协商产生出来的,参加协商的仅3.72万人,其他党员、群众则以“讨论、广泛征求意见”一语带过。

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改革

1978年3月,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就提出:“党委的领导,主要是政治的领导……同时,是通过计划来领导”这一重要思路。1980年,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党过去领导的弊端、今后如何领导作了全面阐述。根据邓小平的一系列指示精神,党的十二大报告在有关党执政方面提出了“党的工作和政府工作,企业事业单位中党的工作和行政、生产工作,必须适当分工”。十二大党章第一次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之后,党政领导实行分任制度,行政事务实行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会议成为行政和企业事业系统集体决策的形式,恢复行政监察系统,更重要的是,在实现执政途径方面,加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提出了实行党政职能分开的若干具体设想:(1)理顺党政关系。党的领导是政治领导,即把握政治方向、提出决策建议和向国家政权机关推荐重要干部。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2)调整党的组织机构。为了适应党的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的转变,必须调整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机构。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党的机构要少而精,与政府机构重叠对口的部分应当撤销,他们现在管理的行政事务应转由政府有关部门管理。政府各部门现有的党组各自向批准它成立的党委负责,不利于政府机关的统一和效能,要逐步撤销。

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不处理法纪和政纪案件,应当集中力量管好党纪,协助党委管好党风。落实属地原则,现在由上级行政部门党组织垂直领导的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要逐步改由所在地方党委领导。(3)改变“一元化”领导模式。企业党组织的作用是保证监督,不再对本单位实行“一元化”领导,而应支持厂长、经理负起全面领导责任。事业单位中的党组织,也要随着行政首长负责制的推行,逐步转变为起保证监督作用。(4)尊重群众自治。在党和政府同群众组织的关系上,要充分发挥群众团体和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逐步做到群众的事情由群众自己去办。(5)改革干部人事制度。要对国家干部进行合理分解,改变集中统一管理现状,建立科学的分类管理体制;改变用党政干部的单一模式管理所有人员的现状,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制度;改变缺乏民主法制的现状,实现干部人事的依法管理和公开监督。十三大还提出党政分开才能解决党驾驭矛盾,“总揽全局,真正发挥协调各方面作用”的问题。党的十四大则提出“必须按照民主化和法制化紧密结合的要求,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党的十五大首次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把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依法办事统一起来,这是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认识的重大突破。十五大报告指明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发展民主,加强法制,实现政企分开、精简机构,完善民主监督制度,维护安定团结。确认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确认“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国家的权力”。在重申党的十四大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基础上,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提出“保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使政治协商制度“成为党团结各界的重要渠道”的重要问题。

四、党执政方式的变化需要一定的资源、结构、功能体系

执政方式的演变,除了对这个问题认识程度的深化外,也与政党自身能力提高有关。党执政的资源体系包括阶级与社会、党员和组织、理论与信念、章程和制度、人才与政治家、权威与民主。党执政后的组织基础不断扩大,党员构成日趋合理。从一进城大量吸收工人阶级党员,到八大前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大量发展知识分子入党,以及近年来广泛吸收社会各方面优秀分子入党,使党的阶级基础、群众基础、知识构成不断改善和更新,如下表所示(略)。

执政党的阶级性与其代表性没有内在冲突,党的十六大提出了两个“先锋队”的论断,在赢得工人阶级的同时,赢得整个中华民族,大大增强了党的社会基础。党通过培养政治家和向社会输送精英,通过执政兴国的实在政绩赢得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改善自己的形象,提高党的领导权威。

党执政的结构体系也在变迁,除过去以“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党处于社会轴心地位”为号召外,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科学理念,党的十六大则更具体地提出“依法执政”的概念。标志党的领导由一元化模式向法治模式的现实转变。

党的执政功能除继续国家建设、社会整合、政策供给以外,开始注重对全社会价值体系的合理构建,注意全社会利益协调,依法保障各种合法权益,保证社会公正和全社会协调发展。党特别注意强化自己全局调控功能,综合人民利益要求、政治诉求,将党的意志通过国家意志的形式贯穿于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

毛泽东的俭朴生活

□ 杨春贵



毛泽东穿着补丁衣服在延安给干部作报告

节俭、朴素，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共同特点。一代伟人毛泽东，更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的故居里，至今还存放着毛泽东生前用过的衣物。这些衣物中，有褪了色、打了补丁的毛巾被，有分别打了69个补丁和57个补丁的两件睡衣，还有一双补了又补缝了又缝的老化龟裂的红皮革拖鞋。

毛泽东的节俭、朴素是一贯的。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本色。

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说，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能多一发子弹。因此，他的衣服总是补丁上缀着补丁。在陕北杨家沟时，他的一套灰军装，有的部位已经磨得薄如蝉翼，有的部位则补丁摞补丁厚似硬纸板。但他依然舍不得扔掉。一天，卫士长李银桥拎着这套军装对毛泽东说：“主席，你看看吧，再穿就该出洋相

了。说不定您作报告，在台上一作手势它就会碎成布片了。”李银桥的意思是想让主席批准把这套衣服扔掉。因为没有主席批准，主席的任何衣服都不准扔。

毛泽东接过衣服，将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大腿上，慢慢地抚摸着，捋平上面的皱纹，一边捋，一边说，它跟我参加过洛川会议啊！最后，还是没舍得扔掉。

转战陕北期间，毛泽东只有一条毛巾。擦脸擦脚都用那条毛巾。因为用得时间太久，毛巾的“毛”全都磨掉了，像个抹布。

李银桥劝他说：“主席，再领条新毛巾吧！这条旧的擦脚用。擦脚擦脸应该分开嘛！”毛泽东听了他的话，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分开就不平等了，现在每天行军打仗，脚比脸辛苦多了。我看不要分了，分开脚会有意见的。”

李银桥知道，主席实际上是舍不得再领新毛巾。

毛泽东就是这样，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衣服指挥着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以至于他在进京时，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1949年，毛泽东进了北京城，曾在香山双清别墅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

他在见张澜前，吩咐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



毛泽东和战士穿着同样的服装在陕北转战

很高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然而,李银桥在毛泽东所有的家当中翻了又翻,找了又找,竟挑不出一件不破或者不打补丁的衣服来。

李银桥很难受,对毛泽东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了,一件好衣服都没有。”毛泽东劝慰他:“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我们会考出好成绩。张先生是贤达之士,不会怪我们的。”

就这样,他硬是穿着补丁衣服见了张澜,又见了沈钧儒、李济深、郭沫若、陈叔通等知名人士。毛泽东的朴素生活赢得了这些知名人士的尊敬。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说,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因此,他从1953年底到1962年底,9年的时间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外面的制服破了,就送到王府井织补;内衣破了,就由身边的工作人员补好。他的粗线袜子上总是带着补丁。有时一伸腿,裤脚抽上来,袜子上的补丁就会露出来。卫士们看不过去,劝他换新的。毛泽东总是说,没关系,穿在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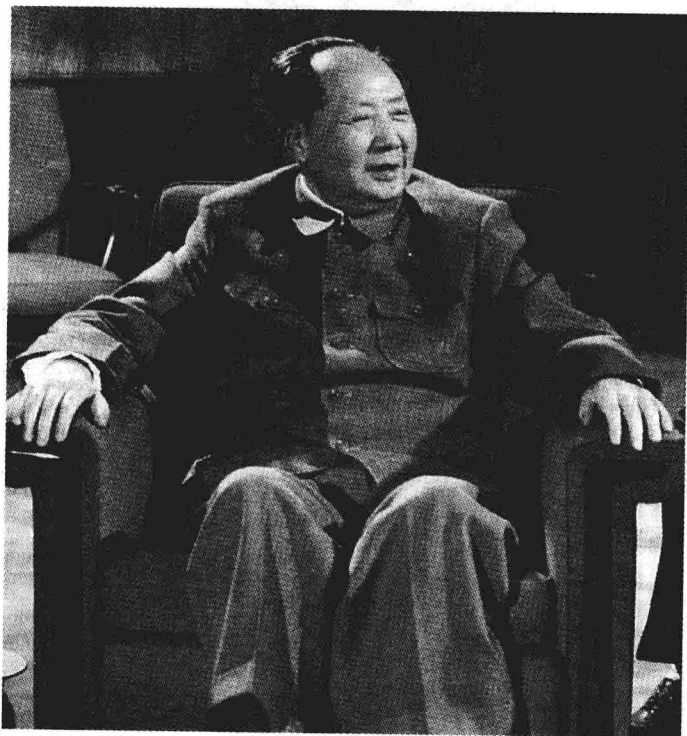
毛泽东不仅在穿着上俭朴,在饮食上也是如此。战争年代、三年困难时期,自不必说,就是在其他物质条件好的岁月,他的饮食仍然非常简单节约。他很少正经坐在饭桌旁用餐,而是经常在卫士值班室的电炉子上煮一缸麦片粥或一缸子挂面,就着霉豆腐吃下去,就算一顿饭。即使坐在饭桌旁用正餐,一般也是四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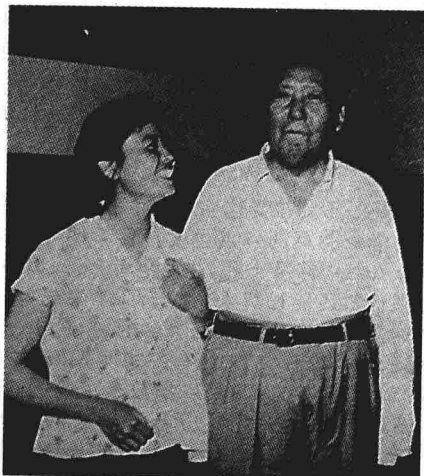
战争年代,毛泽东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

一汤,而且这四菜还包括一盘干辣子,一碟霉豆腐。有时这一汤,就是吃过的菜盘加点水制成。

毛泽东不但自身俭朴,而且对子女也是严格要求。1949年10月中旬,他的长子毛岸英和刘思齐举行了婚礼。婚礼非常简朴。毛泽东送给儿子、儿媳的礼物是一件穿过的黑色呢子大衣。毛泽东对儿子、儿媳说:“你们结婚了,我很高兴。可我又没有什么东西送给你们。这件大衣送给你们俩,略表我的心意。以后岸英白天穿,晚上你们俩盖,也算我送了礼物给思齐了。”



即使在接见外宾时,毛泽东的穿着也非常朴素



衣着朴素的毛泽东接见人民大会堂服务员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在贵阳与人民群众谈话

作为在这个世界上走了一遭的伟人，周恩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有形的东西，但是他的身影却时时在我们身边。至今，许多人仍是一提总理双泪流，一谈国事就念总理。陆放翁诗：“何方化身千亿，一树梅前一放翁”。是什么办法化作总理身千亿，人人面前有总理呢？难道世界上真的有什么灵魂永恒？伟人之魂竟是可以这样地充盈天地，浸润万物吗？就像老僧悟禅，就如朱子格物，自从1976年1月国丧以来，我就常穷思默想这个费解的难题。近30年了，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一个理：总理这时时处处的“有”，原来是因为他那许许多多的“无”，那些最不该，最让人想不到、受不了的“无”啊。总理的惊人之无有六。

总理的一无是死不留灰

周恩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留骨灰的人。当总理去世的时候，正是中国政治风云变幻的日子，林彪集团刚被粉碎，江青“四人帮”集团正自鸣得意，中国上空乌云压城，百姓肚里愁肠千结。1976年新年刚过，一个寒冷的早晨突然广播里传出了哀乐。人们噙着泪水，对着电视一遍遍地看那个简陋的遗体告别仪式。过了几天，报上又公布了八宝山火化，并且根据总理遗嘱不留骨灰。1月15日下午追悼会结束后，邓颖超就把家属召集到一起，说总理在十几年前就与她约定死后不留骨灰。灰入大地，可以肥田。当晚，邓颖超找来总理生前党小组的几个成员帮忙，一架农用飞机在北京如磐的夜色中冷清地起飞，飞临天津，这个总理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又沿着渤海湾飞临黄河入海口，将那一捧银白的灰粉化入海空，也许就是这一撒，总理的魂魄就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天地。

但人们还是不能接受这一事实。多少年后还是有人提问，难道总理的骨灰就真的没有一点也没有留下吗？中国人和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习惯修墓土葬，这对生者来说，以备不时之需，对死者来说则希望还能长留人间。千百年来越有权的人就越下力气去做这件事。许多世界上著名的陵寝，中国的十三陵，印度的泰姬陵，埃及的金字塔，还有一些埋葬神父的大教堂，我都看过。共产党是无神论，又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当然不会为自己的身后事去费许多神。所以一解放，毛泽东就带头签名火葬，以节约耕地，但彻底如周恩来这样连骨灰都不留却还是第一次。你看一座八宝山，还不就是存灰为记吗？历史上有多少名人，死后即使无尸上土，还要为他修一个衣冠冢。老舍先生的追悼会上，骨灰盒里放的是一副眼镜，一支钢笔。纪念死者总得有个念物，有个引子啊。

大无大有周恩来

□ 梁 衡

没有灰，当然也谈不上埋灰之处，也就没有碑和墓，欲哭无泪，欲祭无碑，魂兮何在，无限哀思寄何处？生时鞠躬尽瘁，死后不留麻烦。他是一个只讲奉献，献完转身就走的人，不求什么纪念的回报和香火的馈赠。也许隐隐还有另一层意思。以他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忠君，他更不愿在身后出现什么“僭越”式的悼念，或因此又生出一些政治上的尴尬。果然，地球上第一个为周恩来修纪念碑的，并不是在中国，而是在日本。第一个纪念馆也并不是建在北京，而是在他的家乡。日本的纪念碑是一块天然的石头，上面刻着他留学日本时的那首《雨中岚山》。一个曾叫世界天翻地覆的英雄，一个为民族留下了一个共和国的总理，却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下，这强烈的反差，让人一想，心里就有如坠落千丈似地空茫。

总理的二无是生而无后

中国人习惯续家谱，重出身，爱攀名人之后也重名人之后。刘备明明是个编席卖履的小贩，却攀了个皇族之后，被尊为皇叔，诸葛亮和关、张、赵、马、黄等一批文武，就捧着这块招牌，居然三分天下。一般人无后无后，还是个人和家族的事。名人无后却成了国人的遗憾。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理并不脱俗，也不寡情。我在他的绍兴祖居，亲眼见过抗战时期他和邓颖超回乡动员抗日时，恭恭敬敬地续写在家谱上的名字。他在白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搜求烈士遗孤，安排抚养。他常说：不这样我怎么能对得起他们的父母？他在延安时亲自安排将瞿秋白、蔡和森、苏兆征、张太雷、赵世炎、王若飞等烈士子女送到苏联好生教育、看护，并亲自到苏联去与斯大林谈判，达成了一个谁也意想不到的协议：这批子弟在苏联只求学，不上前线（而苏联



1961年5月，周恩来总理坐在河北农村一户农家的门槛上与社员唠起家常



1960年5月，周恩来总理由陈毅副总理陪同，率中国友好代表团出访蒙古人民共和国。

国际儿童院中其他国家的子弟，在战争中上前线共牺牲了21名)。这恐怕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人物，达成的一个最小的协议。总理何等苦心，他是为烈士存孤续后啊。六七十年代，中日民间友好往来，日本著名女运动员松崎君代，多次受到总理接见。当总理知道她婚后无子时，便关切地留她在京治病。并说有了孩子可要告诉一声啊。1976年总理去世，她悲呼道：“周先生，我们已经有了孩子，但还没有来得及告诉您！”确实，子孙的繁衍是人类最实际的需要，是人最基本的情感。但是天何不公，轮到总理却偏偏无后，这怎么能不使人遗憾呢？是残酷的地下斗争和战争夺去了邓颖超同志腹中的婴儿，以后又摧残了她的健康。但是以总理之权、之位、之才和一个倾倒多少女性的风采，何愁不能再建家室，传宗接代呢？这在解放初党的中高级干部中不乏其人。但总理没有，他以倾国之权而坚守平民之德。后来有一个厚脸皮的女人写过一本书，称她自己就是总理的私生女，这当然经不起档案资料的核验。一阵哗然之后，如风吹黄叶落，复又秋阳红。但人们在愤怒之余心里仍然隐隐存着一丝的惆怅，中国人的传统文化是求全求美的，如总理这样的伟人该是英雄美人、父英子雄、家运绵长的啊。然而，这一切都没有。这怎么能不在国人心中凿下一个空洞呢？

总理的三无是官而不显

千百年来，官和权是连在一起的。官就是显赫的地位，就是特殊的享受，就是人上人，就是福中福，官和民成了一个对立的观念，也有了一种对立的形象，但周恩来作为一国总理则只求不显。在外交、公务场合他是官，而在生活中，在内心深处，他是一个最低标准的平民。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位平民宰相，是世界上最平民化的总理。一次他出国访问，内衣破了送到我驻外使馆去补，去洗。当大使夫人抱着这一团衣服回来

时，伤心的泪水盈眶。她怒指着工作人员道：“原来你们就这样照顾总理啊！这是一个大国总理的衣服吗？”总理的衬衣多处打过补丁，白领子和袖口是换过几次的，一件毛巾睡衣本来白底蓝格，但早已磨得像一件纱衣。后来我见过这件睡衣，瞪大眼睛也找不出原来的纹路。这样寒酸的行头，当然不敢示人，更不敢示外国人。所以总理出国总带一只特殊的箱子，这专用箱里锁着一个贫民的灵魂。而当总理在国内办公时就不必这样遮挡“家丑”了，他一坐到桌旁，就套上一副蓝布袖套。许多政府工作报告，国务院文件和震惊世界的声明，都是在这蓝袖套下写出的啊。只有总理的贴身人员才知道他的生活实在太不像个总理。总理一人城就住在中南海西花厅办公，一直住了25年，这是座老平房，又湿又暗，多次请示总理都不准维修。终于有一次工作人员趁总理外出时将房子小修了一下。《周恩来年谱》记载：1960年3月6日，总理回京，发现房已维修，当晚即离去暂住钓鱼台，要求将房内的旧家具(含旧窗帘)全部换回来，否则就不回去住。工作人员只得从命。一次，总理在杭州出差，临上飞机时地方上送了一筐南方的时鲜蔬菜，到京时被他发现，严厉批评了工作人员，并命令折价寄钱去。一次，总理在洛阳视察，见到一册碑贴，问秘书身上带钱没有，没有钱，总理摇摇头走了。总理从小随伯父求学，伯父的坟迁，他不能回去，先派弟弟去，临行前又改派侄儿去。为的是尽量不惊动地方。一国总理啊，他理天下事，管天下财，住一室，食一蔬，用一物，办一事算得什么？

总理的四无是党而不私

1974年，康生被查出癌症住院治疗。周恩来这时也有绝症在身，还是拖着病体常去看他。康一辈子与总理不合，总理每次一出病房他就在背后骂。工作人员告诉总理，说既然这样您何必去看他。但总理笑一笑，还是去。这种以德报怨，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事，在他一生中举不胜举。周总理同胞兄弟三人，他是老大，老二早逝，他与三弟恩寿情同手足。恩寿解放前经商为我党提供过不少经费，解放后安排工作到内务部，他指示职务要安排得尽量低些，因为他是我弟弟。后恩寿胃有病，不能正常上班，他又指示要办退休，不上班就不能领国家工资。曾三部长执行得慢了些，总理又严厉批评说：“你不办，我就要给你处分了。”“文革”中总理尽全力保护救助干部。一次范长江的夫人沈谱(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之女)找到总理的侄女周秉德，希望能向总理转交一封信，救救长江。周秉德是沈钧儒长孙儿媳，沈谱是她丈夫的亲姑姑。范长江是我党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又是沈老的女婿，总理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以这样深的背景，周秉德却不敢接这封信，因为总理有一条家规：任何家人不得参与公事。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周恩来总理挥臂双臂，对着在人民大会堂欢呼、雀跃的人们大声喊：“同志们，不要跳，再跳楼板就要塌了！”

如果说总理要借在党的力量谋大私，闹独立，闹分裂，篡权



1966年，在玉泉山下，周恩来总理迎着初升的太阳，手搭凉棚，向远方张望。他的表情显得凝重、忧郁和焦虑。

他的话，他比任何人都最多的机会，最好的条件。但是他恰恰以自己坚定的党性和人格的凝聚力，消除了党内的多次摩擦和四次大的分裂危机。50年来他是党内须臾不可缺少的凝固剂。第一次是红军长征时，这时周恩来身兼五职，是中央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之一、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在遵义会议上，只有他才有资格去和博古、李德争吵，把毛泽东请了回来。王明派对党的干扰基本排除了（彻底排除要到延安整风以后），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又冒出个张国焘。张兵力远胜中央红军，是个实力派。有枪就要权，不给权就翻脸，党和红军又面临一次分裂。这时周恩来主动将自己担任的红军总政委让给了张国焘。红军总算统一，得以顺利北进，扎根陕北。第二次是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1957年底，冒进情绪明显抬头，周恩来、刘少奇、陈云等提出反冒进。后来周恩来立即站出将责任全部揽在自己身上，几乎逢会就检讨，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住党的团结，保住一批如陈云、刘少奇等有正确经济思想的干部，留得青山在，为党渡危机。而他在修订规划时，又小心地坚持原则，实事求是。他藏而不露地将“十五年赶上英国”，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多的一点时间”，加了九个字。将“在今后十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删去了“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不要小看这一加一减八九个字，果然一年以后，经济凋敝，毛泽东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搞经济还得靠恩来、陈云，多亏恩来给我留了三年余地。第三次是“文革”中，林彪骗取了毛主席信任。这时作为二把手的周恩来再次让出了自己的位置。他这个当年黄埔军校的主任，须向他当年的学生，现在的副统帅请示汇报。果然，“九大”之后只有两年多，林彪自我爆炸，总理连夜坐镇大会堂，弹指一挥，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为国为党再定乾坤。让也总理，争也总理，一屈一伸又弥合了一次分裂。第四次，林彪事件之后总理威信已到绝高之境，但“四人帮”的篡权阴谋也到了剑拔弩张的境地。这时已经不是拯救党的分裂，而是拯救党的危亡了。总理自知身染绝症，一病难起，于是他在抓紧寻找接班人，寻找可以接替他与“四人帮”抗衡的人物，他找到了邓小平。1974年12月，他不顾危病在身飞到韶山与毛泽东商量邓小平的任职。小平一出山，双方就展开拉锯战。这时总理躺在医院里，就像诸葛亮当年卧病军帐之中，仍侧耳静听着帐外的金戈铁马声。“四人帮”惟一忌惮的就是周恩来还在世。这时主席病重，全党的安危系周恩来于一身，他生命延缓一分

钟，党的统一就能维持一分钟。现在他躺在床上，像手中没有了弹药的战士，只能以重病之躯扑上去堵枪眼了。癌症折磨得他消瘦；发烧，常处在如针刺刀割般的疼痛中，后来连大剂量的镇痛、麻醉药都已不起作用。但是他忍着，他知道多坚持一分钟，党的希望就多一分。因为人民正在觉醒，叶帅他们正在组织反击。他已到弥留之际，当他清醒过来时，对身边的人员说：“你去给中央打一个电话，中央让我活几天，我就活几天！”就这样一直撑到1976年1月8日。这时消息还未正式公布，但群众一看医院内外的动静就猜出大事不好。这天总理的保健医生外出办事，一个熟人拦住问：“是不是总理出事了，真的吗？”他不敢回答，稍一迟疑，对方转身就走，边走边哭，终于放声大哭起来。9个月后，百姓心中的这股怨气，一举掀翻了“四人帮”。总理在死后又一次救了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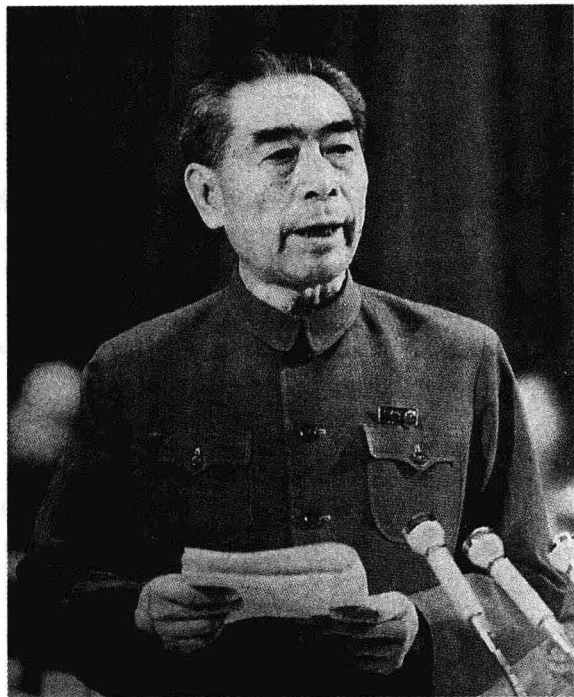
总理的五无是劳而无怨

周总理是中国革命的第一吃苦人。上海工人起义、“八一”起义、万里长征、三大战役，这种真刀真枪的事他干；地下特科斗争、国统区长驻虎穴，这种生死度外的事他干；解放后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这种大管家的烦人杂事他干；文化革命中上下周旋，这种在夹缝中委曲求全的事他干。如果计算工作量，他真正是党内之最。周恩来是1974年6月1日住进医院的，而据资料统计，1至5月共139天，他每天工作12至14小时有9天；14至18小时有74天；19至23小时有38天；连续24小时有5天。只有13天工作在12小时之内。而从3月中旬至5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之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21次，外事活动54次，其他会议和谈话57次。他像一头牛，只知道负重，没完没了地受苦，有时还要受气。1934年，因为王明的左倾路线和洋顾问李德的指挥之误，红军丢了苏区，血染湘江，长征北上。这时周恩来是军事三人团之一，他既要负失败之责，又要说服博古恢复毛泽东的指挥权。1938年，他右臂受伤，两次治疗不愈，只好远走苏联。医生说为了彻底好，治疗时间就要长一些。他却说时局危急，不能长离国内，只短住了6个月。最后还是落下个臂伸不直的残疾。而林彪也是治病，也是这个时局，却在苏联从1938年住到了1941年。文化革命中，周恩来成了救火队长，红卫兵要揪斗陈毅，周恩来苦苦说服无效，最后震怒道：我就站在大会堂门口，看你们从我身上踩过！这时国家已经瘫痪，全国人除少数造反派大多数都成了逍遥派，就只剩下周恩来这样的苦撑派。他像扛着城门的力士，放不下，走不开。每天无休止地接见，无休止地调解。饭都来不及吃，服务员只好在茶杯里调一点面糊。文革中干部一层层地被打倒。他周围的战友，副总理、政治局委员已被打倒一大片，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被打倒了，但偏偏留下了他一个。他连这种“休息”的机会也得不到啊。全国到处点火，留一个周恩来东奔西跑去救火，这真是命运的悲剧。他坦然一笑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大厦将倾，只留下一根大柱。这柱子已经被压得吱吱响，已经出现裂纹，但他还是咬牙苦撑，由于他的自我牺牲，他的厚道宽容，他的任劳任怨，革命的每一个重要关头，每一次进退两难，都离不开他。许多时候他都左右逢源，稳定时局，多难、多累、多险的活，都由他去顶。他能够负起那让常人看来，无论如何也负不动的委曲。

总理的六无是死不留言

1976年元旦前后，总理已经到了弥留之际。这时中央领导对总理病情已是一日一问，邓颖超同志每日必到病房陪坐。可惜总理将去之时正是中央领导核心中鱼龙混杂，忠奸共处的混乱之际。好斗之徒江青、王洪文常假惺惺地慰问却又暗藏杀机。这时忠节老臣中还没有被打倒的只有叶剑英了。叶帅与总理自黄埔时期起便患难与共，又共同经历过党史上许多是非曲折。眼见总理已是一日三厥，气若游丝，而“四人帮”又趁危乱国，叶帅心乱如麻，老泪纵横。一日他取来一叠白纸，对病房值班人员说，总理一生顾全大局，严守机密，肚子里装着很多东西，死前肯定有话要说。你们要随时记下。但总理去世后，值班人员交到叶帅手里的仍然是一叠白纸。

当真是总理肚中无话吗？当然不是，在会场上，在向领袖



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讲话

汇报时,在对“四人帮”斗争时,在与同志谈心时,该说的都说过了,他觉得不该说的,平时不多说一字,现在并不因为要撒手而去就可以不负责任,随心所欲。总理的办公室和卧室同处一栋,邓颖超同志是他一生的革命知己,又同是中央高干,但总理工作上的事邓颖超自动回避,总理也不与她多讲一字。总理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他一把,秘书一把,警卫一把,邓颖超没有,她要进办公室必须先敲门。周总理把自己一劈两半,一半是公家的人,党的人,一半是他自己。他也有家私,也有个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但是这两部分泾渭分明,决不相混。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可谓至纯至诚,但也不敢因私犯公。他们两人,丈夫的心可以全部掏给妻子,但决不能搭上公家的一点东西;反过来妻子对丈夫可以是十二分的关心,但决不能关心到公事里去。总理与邓大姐这对权高德重的伴侣堪称是正确处理家事国事的楷模。诗言志,为说心里话而写。总理年轻时还有诗作,现在东瀛岛的诗碑上就刻着他那首著名的《雨中岚山》。皖南事变骤起,他愤怒地以诗怨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但解放后,他除了公文报告,却很少有诗。当真他的内心情感之门关闭了吗?没有。工作人员回忆,总理工作之余也写诗,用毛笔写在信笺上,反复改。但写好后又撕成碎片,碎碎的,投入纸篓,宛如一群梦中的蝴蝶。除了工作,除了按照党的决定和纪律所做的事,他不愿再表白什么,留下什么。瞿秋白在临终前留下一篇《多余的话》将一个真实的我剖析得淋漓尽致,然后昂然就义,舍身成仁,坦白是一种崇高。周恩来在临终前只留下一叠白纸。“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就无我,我复何言哉?”不必再说,又是一种崇高。

周恩来的六个“大无”,说到底是一个无私。公私之分古来有之,但真正的大公无私自共产党始。1998年是周恩来诞辰百周年,也是划时代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50周年。是这个宣言公开提出要消灭私有制,要求每个党员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我敢大胆说一句,150年来,实践《宣言》精神,将公私关系处理得这样彻底、完美,达到如此绝妙之境者,当数周恩来。因为即使如马恩、列宁也没有他这样长期处于手握党权、政权的诱惑和身处各种矛盾的煎熬。总理在甩脱自我,真正实现“大无”的同时却得到了别人没有的“大有”。有大智、大勇、大才和大貌——那种倾城倾国,倾倒联合国的风貌,特别是他的大爱大德。

他爱心博大,覆盖国家、人民及整个世界。你看他大至处理国际关系,小至处理人际关系,无不充满浓浓的,厚厚的爱心。美帝国主义和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曾是积怨如山的,但

是战争结束后,1954年周恩来第一次与美国代表团在日内瓦见面时就发出友好的表示,虽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拒绝了,或者是不敢接受,但周恩来还是满脸的宽厚与自信,就是这种宽厚与自信,终于吸引尼克松在我们立国21年后,横跨太平洋到中国来与周恩来握手。国共两党是有血海深仇的,蒋介石曾以巨额大洋悬赏要周恩来的头。但是当“西安事变”,蒋介石已成阶下囚,国人皆曰可杀,连曾经向蒋介石右倾过的陈独秀都高兴地连呼打酒来,蒋介石必死无疑。但是周恩来只带了10个人,进到刀枪如林的西安城去与蒋介石握手。周恩来长期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在重庆,南京,在北平,到最后,这些敌方代表竟为他的魅力所吸引,投向了中共。只有团长张治中说别人可以留下,从手续上讲他应回去复命。周却坚决挽留,说“西安事变”已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张学良),这次不能重演悲剧,并立即通过地下党将张的家属也接到了北平。他的爱心征服了多少人,温暖了多少人,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叹服。宋美龄连问蒋介石,为什么我们就没有这样的人。美方与他长期打交道后,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去扶植蒋介石。至于他对人们的爱,革命队伍内同志的爱,更是如雨润田,如土载物般地浑厚深沉。曾任党的总书记犯左倾路线错误的博古,可说是经周恩来亲手“颠覆”下台的,但后来他们相处得很好,在重庆博古成了周的得力助手。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讲话说:“他可能有过多敌人,但未必有一个私敌。”这话移来评价周恩来最合适不过。当周恩来去世时,无论东方西方同声悲泣,整个地球都载不动这许多遗憾许多愁。

他的大德,再造了党,再造了共和国,并且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无私和儒家传统的仁义忠信糅合成一种新的美德,为中华文明提供了新的典范。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周恩来则是党和国家的养护人。他硬是让各方面的压力,各种矛盾将自己压成了粉,养成了油,润滑着党和共和国这架机器,维持着它的正常运行。50年来他亲手托起党的两任领袖,又拯救过共和国的三次危机。遵义会议他扶起了毛泽东,“文革”后期他托出邓小平。作为两代领袖,毛、邓之功彪炳史册,而周恩来却静静地化作了那6个“无”。建国后他首治战争创伤,国家复苏;二治大跃进灾难,国又中兴;三抗林彪江青集团,铲除妖孽。而他在举国欢庆的前夜却先悄悄地走了,走时连一点骨灰也没有留。

这就是生命的哲学。

周恩来还会伴我们到永远。



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46周年纪念照。

马庆华与一件白衬衣

一件普通的白棉布衬衣,对现代人来说算不了什么。即使是崭新的,年轻人穿在身上也会觉得寒碜。但是,在战争年代,特别是在物资奇缺的抗战时期,战士要能有一件白棉布衬衣,那就算是非常珍贵的服装了。说起白衬衣,不由人联想起当年中共豫东特委书记马庆华的一个动人故事。

那是在1938年2月,日本鬼子侵犯中原前夕,中共河南省委为了更有效地打击侵略者,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决定将原在开封扶轮小学做地下工作的马庆华派驻豫东开展抗日武装力量的组建工作,后任中共睢杞太特委书记兼新四军睢杞太独立大队政治委员。

马政委中等个,漫长脸,二目炯炯有神,经常穿套洗得发白的灰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显得格外威武,一看就知道是位能征善战的勇

将。

有一次,队伍行军休息时,马政委解开了灰色军装的领口,里面露出了洁白的衬衣领子。乍一看去,马政委的衬衣还挺新呢!其实只是个“好领子”。老马原有一件白衬衣,在开封做地下工作时就已经穿破了,上面打了20多个补钉,不过另衬上一个不烂的领子。大家为此还凑了个歇后语:马政委的衬衣——金玉其外。到1939年夏季,供给处的副官段常贵见马政委的衬衣实在不能穿了,没打招呼就给他做了件白粗布衬衣,恭恭敬敬地送去。没想到,却受到了马政委的严厉批评。

当时,马政委用手摸着新衣,把脸一沉,若有所思地说:“目前物资紧张,战士都没有衣服穿,你们却专为我做这么件新的,这不是让我搞特殊吗?这个情我可不敢领!”他看供给处的同志为难,就又耐心地解释说:“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可我们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

官兵平等。战士们打鬼子,整天在弹雨里过日子,他们穿的是啥呀!我这件衬衣虽然破点,但补补还能穿,你们让我换新的,这不是让我高人一等吗?同志啊,等到大家都有新衣服穿时,我再换新的。”一席话说得副官段常贵又惭愧,又感动,终于把那件衬衣又送回了供给处。

让人痛心的是,马政委没有等到穿上新衬衣,就于1939年农历6月20日,在睢县宋庄对日伏击战中壮烈牺牲。那天,马政委神色安详地躺在担架上,半睁的双眼静静地注视着瓦蓝色的天空。他的身上,仍然穿着那套洗得发白的灰色军装,一条武装带紧紧地扎在腰间,敞开的衣领中露出那件打了20多块补钉的衬衣,洁白的衣领上带着点点鲜红的血迹和发黄的泥土……

为了尊重马政委生前的意愿,让他在九泉之下含笑安息,临终也没有给他换那件新衬衣。

(石岩)

1940年,豫皖苏抗日根据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

“天当房,地当床,
野菜树皮也当粮。
吃‘猪肝’和‘香肠’,
杀敌照样有力量。”

新四军第六支队的干部战士们在一起闲聊的时候,也经常乐哈哈地说自己吃多少猪肝或香肠。

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十分困难,吃顿饱饭尚属不易,怎么还会经常有猪肝和香肠可吃呢?

原来,这是干部战士们打的一个形象化比喻:“猪肝”指的是红高粱面馍馍,“香肠”指的是红芋。

在草根、树皮也拿来充饥的年代,能吃上高粱面馍和红芋也算是美餐了,所以干部战士们经常使用这个乐观诙谐的比喻。这比喻不仅显示了广大指战员们对艰苦生活的蔑视,而且反映了他们的乐观主义精神。

根据地内当时还流传这样一句顺口溜:

“猪肝”·“香肠”·“革命虫”

“虱子本是‘革命虫’,
谁生得多谁光荣!”

虱子是寄生在人身上的害虫,怎么成了“革命虫”呢。这中间也有个故事。

当时,干部战士吃饱肚子尚且困难,穿衣就更难讲究了。常常是冬天降临了,却换不上冬装,还穿着夏天的单裤褂。夏天到了,还穿着冬天的棉袄裤。根本没有替换衣服。又加上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地骚扰根据地,战士们和在地地方上工作的同志,经常是昼伏夜行,在野地里露营。进到村里,也多是在群众的牲口屋里或草窝里和衣而眠,情况异常紧张时,一夜不知要换几个地方。白天、黑夜就那么一身衣服,又没条件经常洗澡,时间一长,每人身上都生满了虱子。工作和战斗紧张时,谁也顾不得管它,偶尔闲来,便觉奇痒难耐,脱下衣服,

见虱子太多,只好用笤帚扫……

当年初夏的一天,夏邑(夏永碭)县党政领导在一农家院中开会。会议间隙,因天气暖和,大家不约而同地脱下棉衣捉虱子。中共夏永碭中心县委书记王学明干脆拿起笤帚扫,其他同志如法炮制,结果一人扫了一小把。县长刘贯一不无感慨地说:“虱子本是‘革命虫’,谁生得多谁光荣!”大家哄堂大笑。这句顺口溜也逐渐流传开去。

是啊!当年抗日根据地的干部战士们,为了民族的生存,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乐于吃苦,勇于牺牲,在极为艰苦的环境里摸爬滚打,浴血奋战。他们虽然衣衫褴褛,食不果腹,身上又生满了虱子,但谁能不说他们是伟大的人,光荣的人!

(盛立)

草鞋

彭雪枫同志爱穿草鞋。我每次见到他，他都是穿着一双黑色袜子和一双草鞋。

最初，我不知道他的草鞋是哪里来的。有一天晚上，我在他屋里谈问题，顺便从他床底下拿出他的一双草鞋，穿在脚上在屋里走走试试，很舒坦，走起路来可真是得劲。他看了笑着对我说：“你也喜欢穿草鞋吗？我可以送你一双穿穿。”我知道他最爱穿草鞋，所以我当时就没有要。第二天，我又到他那里去，他一定要送我一双新的草鞋，我推辞几次，可怎么也不行，最后我只好接受了这双草鞋。我问他：“这草鞋在哪里买的？”他告诉我说：“这是以前住在一个老大爷家里，他帮我打的。”

又过了几天，雪枫同志正忙于指挥一次战斗，忽然一个连长气喘嘘嘘的从外面跑进来，卷着裤腿赤着脚。雪枫同志看他赤着脚，连忙问道：“你的鞋呢？”他回答：“我的鞋破了。”

连长向他作过请示，正要往外走。雪枫同志叫住

1938年5月，永城县被日本军队占领。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汉奸土匪，为虎作伥，老百姓在死亡线上挣扎。1939年2月，彭雪枫奉中央军委之命，率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皖苏，来到永城县西南书店一带，打日本，除汉奸，灭土匪。当地群众犹如久旱的禾苗逢甘雨，死亡线上遇救星。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临近了。彭雪枫思考着群众和部队的的生活问题。新四军游击支队从豫南确山县竹沟誓师东征以来，部队发展很快。外来同志水土不服，加之严冬季节，棉衣不全，三四人合盖一条被子，伤病员逐日增多。整个部队仅剩4块钱，买盐也不够吃一顿。现在又值年关，群众和部队如何过年？怎么能让父老乡亲 and 指战员吃顿饺子？他反复想了几天，没有好办法，最后下了决心，喊道：“小王，拉马！”

警卫员小王把马备好牵来，忙问：“首长，今天往哪出征？”

彭雪枫没有回答。他深情地抚摩着战马，回忆起往事。这是一匹枣红马，身高六尺，长近一丈二，毛如涂脂，胸阔背圆，腿如铜柱，膘肥体健，是少有的好马。这四匹马随他从竹沟出发，杀日寇，打汉奸，剿土匪，救同胞，如同亲密的战友。他扯起马缰绳，真想跃马策鞭杀上战场。只见枣红马昂头“啾啾”直叫，四蹄前扒，好似期待再度一块出征。彭雪枫见此光景，动情地说：“朋友，你风里来雨里去，为我出力效劳，现在为了解决生活困难，我们只好分手了……”他抹掉满眼的泪花，对小王说：

“把鞍镫解下来；马牵到集上卖了！”小王激灵灵打

他说：“没有鞋穿怎么打仗呢？”说着就把自己的一双布鞋拿出来递给连长。连长怎么也不肯收。雪枫同志说：“我还有鞋，你就穿上吧。”看看连长不肯收，又催促说：“快拿去吧！不要耽误时间。”连长把鞋子穿上，看看师长又望望鞋，激动得眼里闪着泪花，说：“不打胜仗我就不回来见师长！”雪枫同志笑着说：“你说错了。消灭敌人再来见我。”连长没等雪枫同志再说什么，转过身就向外跑。刚跑出门外，雪枫同志又把连长喊住了。连长问：“师长还有什么指示？”雪枫同志没有回答他的话，拐到屋里又取出几双草鞋，交给连长说：“把这几双草鞋拿去，分给没鞋穿的战士。”这时我低下头看看我穿的草鞋，再看看这几双草鞋，都是一样的。我不禁怀疑起来：“那位老大爷怎么替他打这么多草鞋？”

一天深夜，我从一个连队回来，看见雪枫同志的屋里还点着烛灯。我就悄悄地走到他的窗户底下，探头一看，只见桌子上除了有一些文件和翻开的书之外，还放了一串子麻和碎布条之类的东西，雪枫同志坐在桌旁的板凳上，看样子他正在思索什么问题，可是手却没有闲，正忙着打草鞋。这时我才明白：雪枫同志不但自己打草鞋穿，而且常常利用时间为同志们打草鞋。

(赵清山口述，熊航昌整理)

彭师长卖马

个冷战：“什么，一〇一（彭雪枫司令员的代号），卖战马！”

“是的。”

警卫员心里急成一团火。彭司令领兵打仗，没有战马怎么能行？再说首长的胃病、枪伤复发了如何是好？当前生活确实困难，但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小王想到这里，眼含热泪央求道：“一〇一，千难万难，这战马可千万不能卖啊！”

“小王，执行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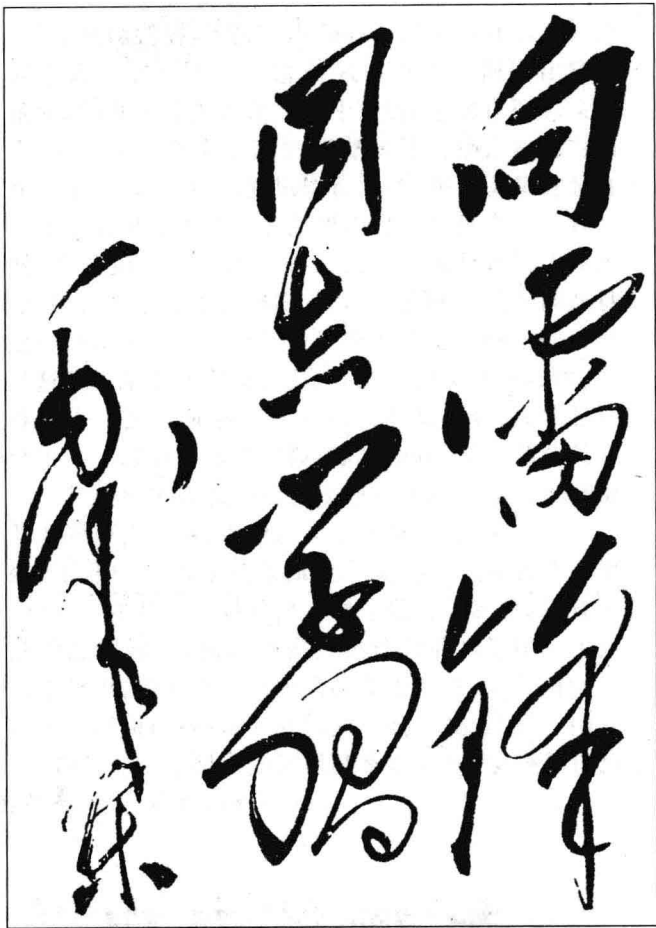
小王知道，一旦首长下了决心，谁也动摇不了。他只好牵着战马，去找大家来讲情。一会儿工夫，司令部里站满了指战员，一个个伤心流泪，齐声哀求：

“一〇一，这战马可千万不能卖啊！”

彭雪枫见来了很多人，心情十分沉重地说：“当年秦琼受困时不是卖过他的黄骠马吗——我们是工农的子弟兵，眼下群众正有难，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为了赶走日寇，救民于水火，一匹战马我们怎么能舍不得呢！小王，不要再犹豫了，牵马去吧！”

小王含着泪水，慢腾腾地牵着那头枣红大马向外走去。其他首长和供给处的马匹，也先后牵到集市上卖掉。就这样，彭雪枫把卖马的钱拿一部分救济当地群众，一部分补充了部队的给养，让军民欢度了1939年的春节。

(侯永之)



雷锋精神长存

□ 蓝 砚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40余年来,雷锋作为青少年一代的光辉楷模,雷锋精神作为我们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社会主义新人健康成长。

雷锋,只活了22年就不幸去世了。虽然,他的一生短暂,但他的精神却长存;虽然,他的一生平凡,但他的形像伟岸。他是普通一兵中走出的伟大战士;他是亿万人民美好情感凝结成的圣洁灵魂。他的魅力不仅在于他是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的体现者,同时也在于他用自己的行为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了最好的诠释。

1. 平凡而伟大的一生

雷锋原名叫雷正兴,1958年要到鞍山钢铁厂工作前改叫雷锋,1940年出生在湖南省望城县一个贫苦农家。他父亲在湖南农民运动中当过农民自卫队长,后遭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毒打致死。母亲在受到地主的凌辱后,于1947年中秋之夜悬梁自尽。不满7周岁的雷锋成了孤儿,被好心的六叔奶奶收养,一起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幼小的雷锋上附近蛇形山砍柴时,被地主婆用刀在左手背上连砍了三刀。雷锋从小对黑暗旧社会充满了仇恨。1949年8月,湖南解放时,小雷锋便找到路过的

解放军连长要求当兵。连长不便同意,把一枝钢笔送给了他,鼓励他要好好学习。

新中国于1949年成立后,雷锋受到共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亲切关怀,1950年夏被送入学校读书,后来加入少先队。1956年他高小毕业后,在乡人民政府和中共望城县委机关当通讯员和公务员,被评为模范工作者,并于195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

雷锋积极投身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热潮之中,参加了根治泅水的工程。1958年春,他到了团山湖农场,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学会了开拖拉机。这年9月,雷锋又响应支援东北“鞍山钢铁厂”建设的号召,到鞍山当了一名

推土机手。第二年8月,他又来到条件艰苦的弓长岭焦化厂参加基础建设,曾带领工友们冒雨奋战,保住了7200袋水泥免受损失。在鞍山和焦化厂工作期间,雷锋被评为先进工作者3次,被评为标兵5次,被评为红旗手18次,并获得“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

1959年12月解放军征兵时,雷锋迫切要求参军,焦化厂领导却舍不得放他走。雷锋跑了几十里路来到辽阳市兵役局(后改叫人武部),表明坚决要求参军的愿望。他身高只有1.54米,体重不足55公斤,都不符合征兵条件,但最后终于以政治素质过硬和有经验、技术,而被破例批准入伍。

雷锋参军后,被编入工程兵某部运输连当汽车兵。他立下誓言:“我要坚决做到头可断,血可流,在敌人面前决不屈服、投降……把我可爱的青春献给祖国最壮丽的事业。”作为一名解放军战士,雷锋刻苦学习毛泽东著作,学习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努力改造世界观,苦练杀敌本领、业务技术,以强烈的国家主人翁的责任感,自觉地为党分忧、为国尽责,经常想到国家和集体,克己奉公,公而忘私,把自己积存的钱全部支援农村和灾区人民。1960年11月8日,雷锋光荣地

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他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奉献更加勤奋。他除完成本职工作外,还努力为党、为国家多做工作,经常利用节假日和休息时间做好事,以热心助人为乐,“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雷锋语)。由于雷锋在平凡岗位上的突出表现,沈阳军区《前线报》开辟了向雷锋学习的专栏。在入伍不到3年的时间里,雷锋荣立二等功1次,三等功3次,被评为“节约标兵”和“模范共青团员”,出席过沈阳军区共青团代表会议。1961年,雷锋升为班长,被选为抚顺市人民代表。1962年8月15日,他因工作中的意外事故不幸牺牲。两天后,雷锋追悼会在抚顺市望花区政府礼堂隆重举行,近10万普通市民自发地护送雷锋的灵柩走向烈士陵园,很多人早已悲痛得泣不成声。

2. 全国上下学雷锋

1963年1月7日,国防部命名雷锋所在的班为“雷锋班”。同年3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在《中国青年》杂志上首先发表。国家主席刘少奇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周恩来总理接连两次题词,要求“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邓小平总书记题词:“谁应当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就应该向雷锋同志的品德和风格学习”。四十多年来,在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的大力倡导下,学习雷锋的活动在祖国大地上持续不断,雷锋的精神与时俱进,不断得到弘扬光大。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学雷锋活动频频掀起高潮。

1990年3月5日,国内各大报刊刊登了江泽民等中央领导人为雷锋的题词。江总书记这样题词:“学习雷锋同志,弘扬雷锋精神。”

同年10月,江总书记到东北视察工作,来到抚顺雷锋纪念馆,并同“雷锋班”战士会面。在雷锋墓前,总书记动情地说:“我提议,向雷锋同志三鞠躬。”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跟随着总书记,深深地鞠躬。江总书记看着雷锋墓的碑文,语重心长地对身边的“雷锋班”战士说:“雷锋是解放军的光荣,是中国人民的光荣。”

在听取“雷锋生前所在团”政委汇报后,江总书记讲话,他说道:“他(雷锋)的宝贵精神遗产,属于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雷锋活动要在全中国展开。……改革开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就更加需要在全国开展向雷锋学习的活动。学习雷锋必须抓住实质,学习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学习他无私奉献的精神。”

在中国,雷锋是一代新人的楷模,又是一批批杰出人物的光辉代表。“雷锋式”干部、战士、工人……成千上万,不断